

# 北伐前後

(續完)

千 國 動

## 我的戎馬生活

### 進入杭州，預備清黨

十六年二月我們進入杭州，這是江南勝地，湖光山色，伴以名城，心境為之一快，八個月長途征戰，得此小休，遂遍遊岳墳、雷峯塔、靈隱寺，和九奇十八景等，晚間到大世界看平劇，軍校各期同學多在此碰頭，黃埔同學會亦由廣州遷來，不時舉行「同樂會」、「懇親會」，有話劇、舞會等節目，餐飲更是豐盛，慰勞我們打仗的人，可說無微不至，雖然杭城仕女極歡迎我們，她們說：「皮帶，皮帶，皮帶上滿是革命的光榮」（時革命軍官，皆掛寬闊刀帶），但我們仍然要保持紀律，樂而不淫。

一天同學會假西湖湖濱路某宅，召集在杭城的同學開座談會，特請剛由南昌來的張靜江先生主持，他那時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我們同學中早年讀總理孫中山先生著的「有志竟成篇」，都知道張先生是有大功於革命的，因此都以虔敬的心情，聽靜江先生的報告和演說，靜江先生說：「我在南昌與蔣總司令多次懇談，覺得以俄顧問鮑羅廷為首的武漢黨部與政府，遇事把持制

肘，阻撓北伐軍事進展，有篡奪國民黨革命成果之大陰謀，如果我們不提高警覺，加意防範，凡是忠

貞的國民黨員，不問老一輩的或年青一代的，也不問文的或武的，即將被排除，可能受到各種不同的處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着北伐的軍事勝利，本黨的革命大業，將要遭到扼殺，其一切成果，也將被共產黨篡奪，十五年七月五日，中央全會通過的分黨辦法，共產黨表面上也舉手同意，實際上半年以來，他們一貫的用黨團暗中活動，進行篡奪，自從總理倡導革命以來，本黨付出了鉅大的犧牲，才建立了中華民國，並喚醒了中國人民，反軍閥，反列強帝國主義，順利的遵照總理遺囑去進行北伐，共產黨看到北伐必然成功，故在武漢把持操縱一切，積極進行篡竊，這是心腹大患，關係本黨四十餘年革命的成敗，我們當前必須從黨、政、軍各方面清除共黨分子，並謀繼續進行北伐，統一中國，完成革命大業云云」……

張靜江先生演說完畢，與會者踴躍發言，對清黨主張都贊成，並各提出意見，以孫文主義學會秘書長葛武榮講話特多，所得結論是：

①東路軍各部隊中之共黨分子，應即首先清除。

②即以東路軍為基礎，對上海、杭州、南京和蘇、浙兩省要地，展開清黨預備工作。

未幾國民黨軍總司令部，由南昌移駐上海龍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亦由白崇禧率領駐上海，所有在東路軍各部隊裏有共黨嫌疑分子，一律調往上海大同大學集中清查。迨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央清黨令正式頒下，為全國共黨中心之上海共黨組織，就澈底粉碎了，其武裝之工人糾察隊，亦全部繳械解散，首要分子，皆逮捕禁錮，杭州、蘇州亦皆同時肅清。我奉派為吳縣兼蘇州市清黨委員會主席，是時江蘇省政府，尚未成立，我又奉派兼吳縣臨時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主委、黨化教育訓練班主任等職。我這些職務，是在上海附屬要地——蘇州，為清除共產黨，並再建國民黨，必須同時統理的工作。在這期間，我曾得到了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秘書長潘宜之、科長楊耀唐、股長鍾震之等支持，對蘇州及由上海逃往吳縣鄉村之共產黨分子，予以致命的打擊，為護黨救國，

効命馳驅，及今回想，對潘宜之、楊耀唐等尤不勝感激與懷念。

### 制裁惡霸遭受控告

我在吳縣、蘇州進行清黨工作期間，見到集中在蘇、滬一帶，失去了革命性早已官僚化了的、腐化了的辛亥前後的同盟會會員，他們認為



南京民衆歡迎北伐軍之情況。

清黨是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於是隨便檢舉誣告，尤其是那個孫傳芳的衛隊團長張鎮，他投降過來，即被任爲第十獨立旅長兼蘇州警備司令，串通其政治部主任程莊，吳縣公安局長伏彪，兩個老同盟會員，對國民黨員及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在我未到之前，大事濫捕，多方敲詐，造成了無限的恐怖，全縣人民敢怒而絕不敢言。當我

與他三人見面時，他們除了擺老資格，大罵共產黨外，幾於一點革命的知識也沒有，似乎並沒有看過三民主義，更談不上有愛國愛民之心，使我大爲駭異，他們與上海方面由中央黨部所設立的宣傳委員會有來往，這個宣委會也是些老同盟會員所組成，中央黨部不過予以承認，給他這樣名義，意在使其爲反共効力，實則他們反共不足，腐化革命陣營有餘，爲共產黨赤化活動製造更多的機會而已，他們集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幫會大爺等腐朽勢力之大成，攀附權勢，獵取利祿，貨財女色，享樂貪縱，結黨把持，漁肉人民，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我在若干次大型集會上，痛斥他們：反共是真的，反革命也是真的，我們清黨反共，是爲了革命與救國救民，絕不是包庇軍閥，政客、土豪、再禍國害民，要在清黨反共的同時，也革這些腐朽惡勢力的命，他們見我們制裁他們，與之鬥爭，毫無妥協的餘地，於是不斷的向上海方面控告，我遂於十六年六月調往南京總政治部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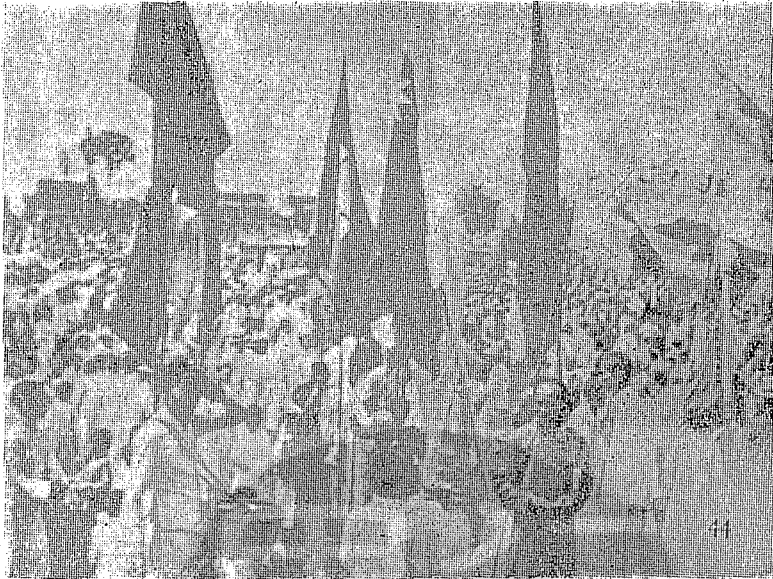
十六年冬，寧、漢合作，國民革命軍總司

令蔣先生辭職，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亦由桂系派陶治公担任，我乃辭職返里葬父，父柩停在堂屋正中，我一入大門，即撫棺痛哭，晚間與兄及弟商量葬父辦法，余此時雖極窮困，不名一文，但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悲痛之下，擬厚葬以稍盡心願，余鄉厚葬之禮，亦不過於歸土之前，請道士誦經七日，並接受戚友之致奠，出殯前一日，集聚來弔親友，各手持香火燈籠火把，舉行「開路」之遊行而已，余雖知此等儀式屬於迷信，然滿腔抑有大恩，此後實無由報答，遂決意行之，惟不請陰陽先生擇日看地耳，余親撰祭文，泣述父親，生性忠厚勤勞，少年爲人當雇農，及在江西景德鎮客上担柴賣，勤儉成家經過，並於余讀書時，親爲余調理飯菜，洗滌衣服，積存學費，陪余溫習四子書及其他經書至深夜，督余背誦，不至錯落而後已，間嘗爲余講三國、隋、唐、宋明忠義故事等，文長五千言，由中學同學胡維漢君，在喪禮一週期間，三次朗誦，親友聽者，莫不流涕，余兄弟姐妹尤每痛哭失聲，「開路」之晚，持香燭火把者千人，繞行鄉里一週，余之內心，祇在減少對父親之愧咎，非敢誇耀鄉里也。出殯之日，執拂者數百人，奉安於蔡家壟祖塋之陽。

### 入軍校軍官團受訓

父親奉安之後，過農曆年，已是十七年二月，我再前往南京，蔣先生已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準備繼續北伐，在出發之前，他親自主持成立軍校附設軍官團，自任團長，黃慕松爲副團

長，馮軼斐為團附，曾養甫為政治部主任，程天放為政治總教官，賴璉、霍寶樹為政治部科長，其餘軍事、政治教官及部隊長，皆一時上選，招收軍校一、二、三、四、五期畢業生，授以較高級教育，蔣先生的意思是要在清黨創傷之後，創造新生命，蓋由清黨已為黨、政、軍帶來了腐敗不革命情況，必須重新注入新血，以補此創傷



蘇州民衆集會熱烈歡迎北伐軍之情況

，我因在入伍生期間提前參加北伐，乃特報考，以期補完我未卒業的操課，錄取後編為第一營第三連，蔣先生在未領軍渡江北伐前，常至操場、課堂，親自督教，見有在課堂精神不好之學員，即指名立正聽講，在操場上見到動作不正確之學員，亦叫出行列，由他親自教導改正，有時蔣先生深夜來查寢室，對同學督教之嚴，與關懷之切，令人無限崇仰。民國二十一年我追隨

蔣先生，從事民族復興運動，更見到他天性勤勞，一天二十四小時，除寢食午休之外，他不是在做操，就是在思索，從自己服裝、辦公環境、文件整理、撰稿、草擬計劃等，皆喜歡親自動手，非至絕對必要，不呼喚侍從人員，蔣先生這樣忠勤為國的崇高的品德，感人至深，我一生每遇拂逆遭受打擊時，總會想到蔣先生偉大的風範和訓誨，於是忍耐，再忍耐，勤奮振作，努力再努力，領袖訓示，中心藏之，無日忘之！

我在軍官團一年肄業期中，努力進修操課，畢業時除得第三名外，更結識了何德用、趙範生、龔煥文、袁其凝四位同學，矢志追隨蔣先生革命報國，我們五人每於晚間自習時間，相約走到大操場人靜處，縱談國內外時事，及中國革命現階段之需要，並作成長篇論文，由趙範生出名，向政治部請教質疑，概由組織科長賴璉先生，精詳的於「軍官團公刊」上，公開的答復，賴先生有高度政治認識，熱情負

責敢言，較之黃埔時代之邵元冲、甘乃光、周恩來、惲代英等，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三民主義革命理論的瑰寶。不幸後來竟被胡適之輩那套非孫文主義革命路線的理論充作國人精神食糧，徒亂人意，難怪唯物共產邪說不息，而孫文主義不著！

民國十八年二月在軍官團畢業，我被分發往駐在合肥之第八師服務，我想這是沒有意義的，當與何德用商量請求留校工作，並退還分發令及旅費，搬到南京細柳巷湖北會館住下，由何德用向其親戚借到銀元五元，維持兩人生活，南京是時物價便宜，兩人吃飯每日五角錢足矣，十日後得到通知，到軍校政治部主任上尉訓育員，由於我任吳縣清黨委員會主席時，任該會秘書長之孫燕迎兄，適任中校政治教官，為我居間說項，我乃得將趙範生、龔煥文、袁其凝等一起，由部隊調回，全任上尉訓育員，其時軍校六期生正在受訓，軍校前期出身者任職軍校，五期不能超過上尉，故我們皆被以上尉任用，我們最大的目的是：南京為首都所在，人文薈集，我們任職軍校，可收教學相長之功，政治部主任鄧佛係一期老大哥，對我們這五位後期同學，極為信任，十八年九月，他保荐一期石美齡為黃埔同學會軍校分會特派員，連帶保我出任幹事，實際上負軍校黃埔同學連絡組訓之責，是時一、二、三、四、五期畢業生，任職軍校者近千人，同學會每月收會費近三千餘銀圓，除分會開支外，上總總會者二千七百元左右，經費充足，舉辦各種活動亦多，是總會之下最有力的組織。

負笈東瀛研習政軍

民國十八、九年軍校各期畢業同學，前住日本留學者甚多，中國自清末建立新軍時起，就以師承日本為主，不僅袁世凱小站練兵，段祺瑞保定軍校，以留日陸軍將校擔任幹部，即創辦黃埔之蔣先生，王柏齡、何應欽兩將軍——號為三傑，亦皆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中國須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為一回事，而學日本明治維新之憲政政治、科學工業、現代化軍事等，作為中國革命改造之借鏡又是一回事，故好友孫慕迺、沈遵晦兩兄，及張竹隱女士三人，極力主張我應趁年青力壯，前往日本學軍事政治，張竹隱女士者廢清學部尚書張百熙之女公子也，固儒俠者流，她在孫慕迺、沈遵晦兩兄同意之下，為我籌得款項二千元，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請得留學證書，於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由留日軍校三期同學黃紹美兄，帶同我到東京，先住在東京市郊江古田地方之宮崎滔天先生次公子、宮崎震作君家，由其夫人教我日文日語，由於住在日人家裏，飲食起居非用日語不能表示意向，故逼使我日語進步較快，中國人一般以為日語日文易學，其實日本語文，仍是自成一系，天資聰穎，努力用功者，庶乎五年能瞭然於其詩詞詠嘆等辭語，其學好之難，較之英、法語文所差無幾，是時軍校畢業生留日住明治大學，研習政經系者極多，如滕傑、葛武榮、蕭贊育、黃紹美、賀衷寒、嚴登漢、魏廷鶴、任覺五等皆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亦勸我進明大，於是乃由留日陸軍學生管理員章鴻春少將，派秘書

葉雪汀先生為我報名、註冊、繳費等手續，正式為明治大學政經系學生，時為民國十九年九月，此際留日軍校各期畢業生三十餘人，分在明治、早稻田及各陸軍學校肄業，除學習本課業外，皆以國民黨東京總支部，及留日軍校同學通信處為中心，研究時事及中國革命諸問題，與我切磋較密者，為葛武榮、黃紹美、伍中定、蕭銳、謝靜生諸人。

民國二十年六月，為了爭取公費，我與謝靜生、蕭銳考入陸軍戶山學校，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行為的訓練學校，專為中少尉級的軍官，予以軍刀、刺槍術的訓練，半年畢業，明治大學也可不退學，停一學期，此校以注重體力改造為起點，食量有規定，起居作息，皆有定時，生理解剖與各部機能，須詳為瞭解，我們入校僅一個月，身體日臻健壯，且似有浩然之氣，日本軍人戰鬥力強，非偶然也。

瀋陽事變奔赴國亂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日軍對我發動侵略，那時我是住在東京市郊上屋敷地方，新建的「文虎社」二樓，文是孫文，虎是宮崎寅藏，取寅屬虎之義，是宮崎龍介兄弟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及其父滔天先生，新建之紀念堂，我與黃紹美、伍中定、謝靜生、蕭銳等均遷居於此，十八日晨我們尚未起床，即聽到報販振鈴大喊，有重要新聞，披衣下樓拾報一閱，其頭條新聞，大標題是：「瀋陽北大營支那軍挑釁，日軍起而膺懲」，小題為「現正激戰，我軍佔領北大營，正向瀋

陽前進。此雖為我們對日軍終將入侵中國意料中事，然仍有晴天霹靂之感，是日謝、蕭、我三人仍穿中華民國陸軍中尉制服前往學校，東京車站往來行人神情緊張，公告框內貼有日軍攻我北大營電傳照片數張，一般行人似乎也特別對我三人注意，實已置身敵國中，到校時中國學員八人皆已前來，日籍教職員及學員們對我等亦如平常，雖仍照常操課，但這一日，實為最長的一日，我們八人協議，次日決不來上課，以示抗議，並作退學回國打算，六時返宿舍，東京街頭商店樣品間，亦有多種電傳照片張貼，顯示日軍已佔據了我瀋陽城，不知屠殺我同胞多少？東京車站有數組大學生，用號筒狂呼捐款勞軍，次晨黃紹美、我等五人至管理員章鴻春少將處，請示他如何處此大變？並率先表示要退學回國，奔赴國難，稍候士官，陸大，及各陸軍專校的中國留學生，亦均來請示，章管理員表示，除與公使館保持接觸外，並電南京訓練總監部請示，他個人意見是：中國此時毫無準備，與日軍作戰，未見有利，我們與其他軍校同學多人，則前往東京國民黨總支部，商量應變辦法，是日到黨部者很多，幾全為軍校各期畢業再留日者，初步決定：除假東京青年會，開華僑大會抗議外，軍校留日同學，應另單獨集會，商討我們的行動。隨後即與留日同學相偕返國，參加軍中政治工作，在最高領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先生領導之下，奔走大江南北，共赴國難。我青年時代投考軍校以及轉往日本研習政治軍事的回憶，寫到此處為止，以下請參閱拙著復興社史話，不再多贅。